

中國學者對《華裔學志》的影響與貢獻

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兼《世界漢學》副主編
任大援

一、小引：中西合作的歷史淵源及評價

明朝万历初年(公元十六世纪末),当耶稣会士范礼安(Alexandre Valignani,1538—1606)、罗明坚(Michel Ruggieri,1543—1607)、利玛竇(Matteo Ricci,1552—1610)先后进入中国,中西文化交流史就进入了“传教士”阶段。¹

这一阶段的特点之一,是中西学者都表现出相互学习的强烈愿望。有人统计,从16世纪至18世纪,在华活动的耶稣会士共达900余人,其中除100余人是中国(包括澳门)人以外,其他都是外国人。有趣的是,绝大多数来华的耶稣会士都起了中国名字,而不少中国耶稣会士却起了外国名。²从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事实,人们可以看出:异域文化与自身文化相互吸引的特点。好奇与吸引,引发了在交流与合作基础上的研究:在西方,汉学(Sinology)出现了;在中国,“西学”(泰西之学)也随之出现了。

在这一过程中,中西方的学者,在思想、观点、方法上,有矛盾与冲突,也有交流与合作,而这两种形式,都推动了中国学术史的发展,也推动了世界学术史的发展。

从“传教士”阶段开始,我们看到一系列人们熟知的例子,留下了中外学者成功合作的典范。例如,明末徐光启与利玛竇的合作与《几何原本》(数学)的出版;李之藻与西方传教士的广泛合作与《天学初函》(神学与科学)的编纂;王征与邓玉函等人的合作与《远西奇器图说》等机械物理学著作的出版;王征与金尼阁的合作与《西儒耳目资》(语言学)的出版;杨廷筠与艾儒略的合作与《职方外纪》(地理学)

¹ 从中西交通史的角度看从中古到近代的中西交往,有四个重要的时代,这就是13至14世纪的“马可波罗时代”,16至17世纪的“利玛竇时代”,19至20世纪的“西域探险考察家时代”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20年的“全面开放时代”。这四个阶段,都已经纳入汉学研究的视野。

²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文版序》,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1,第6页。

的出版；王韬与理雅格(James Legge, 1815—1897)的合作与《中国经典》(*The Chinese Classics* 四书五经)的翻译出版，等等。

进入近代(20世纪)以来，中西学者的交往，进一步在加速度地进行。这一时期的汉学发展，有两个显著的标志，一是汉学讲座的开办，一是汉学(中国学)杂志的兴起。前者，以法国为代表；后者，《华裔学志》是最突出的代表。

沙畹(Emmanuel Edward Chavannes 1865—1918)与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是汉学讲座的重要人物，也是与中国学者合作交流的最重要代表。例如，沙畹早年在清朝驻法国公使馆参赞唐复礼的帮助下，着手翻译《史记》。³他1889年来华，之后在《东方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Peking Oriental Society*)发表《史记封禅书译注》，后来陆续史记译稿，被认为是《史记》的最佳译本。沙畹还通过伯希和与罗振玉书信来往，将所作西域简牍校本寄给罗振玉，经过罗与王国维的磋商、分类、考订，终于合作完成《流沙坠简》，在日本出版。由于沙畹的影响，他的几位大弟子伯希和、马伯乐(Henri Maspero)、葛兰言(Marcel Granet)、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阿列克(V. Alekseev)、叶理绥(S. Elisseev)、及其后学戴密微(Paul Demieville)，在他们的汉学研究中，都与中国学者发生了密切的联系，中国学者对他们的研究工作给予了重要的影响和帮助。除了法国汉学家以外，德国的汉学家如钢和泰(A. von Stael-Hostein)、福兰阁(Otto Franke)、卫礼贤(Richard Wilhelm)、欧特曼(Wilhelm Othmer)、海尼士(Erich Haenisch)、颜复礼(F. Jaeger)鲍润生(Franz Xaver Biallas)、孔好古(August Conraty)等人，同样与中国学者有着不解之缘。20世纪以来，同西方汉学家有较多来往的中国学者有罗振玉、王国维、胡适、朱希祖、顾颉刚、梁启超、陈垣、刘半农、吴宓、陈寅恪、姚从吾、方豪、杨堃、柯劭忞、王重民、沈兼士，等等。以上名单，远不是一个完整的名单，但足以说明，20世纪的中西学者交往，已经成为一种潮流。

从“传教士时代”开始，中外学者的交往，有合作，也有矛盾与歧见，这是必然的。经过矛盾、冲突而达到的理解与合作，是在更高的基础上的和谐。这种交往与合作，也成为这一历史过程中的一个突出特色。中国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在论述中

³ 戴密微《法国汉学研究史概述》，载阎纯德主编《汉学研究》第一辑，第42页。

外文化交流时说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本文通过现代学术史上《华裔学志》的个案，来探讨中国学者对早期华裔学志的影响与贡献，藉以展示学术史上“美美与共”的进程。

二、中國學者對早期《華裔學志》的影響與貢獻

（一）輔仁大學與中國學者的創立之功

讨论中国学者对华裔学志的贡献，如果从源头上说，和辅仁大学的创立密切相关，而辅仁大学的创立，中国学者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学者主要是英华（字斂之）、马良（相伯）、陈垣。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著名天主教爱国人士英斂之、马相伯就曾联名上书罗马教廷，请求在中国创办大学。为了办教育，英斂之甚至放弃了《大公报》，他希望恢复利玛窦等传教士的作风，尊重传统，介绍科学，使中国现代化，为此建立一所规模完善的大学。可是，由于教皇庇护十世于1914年去世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搁置。

英斂之和马相伯并没有停止努力。1913年，英斂之在北京西郊的香山静宜园开始办学，“专为教中子弟教授国学，以挽救教会衰颓的文风”⁴。他用孔子所说“以文会友，以友辅仁”⁵的教诲给学校起名“辅仁社”，后来的辅仁大学，名称盖出于此。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罗马教廷着手考虑英斂之和马相伯关于在北京开办天主教大学的“上书”，相继派代表来华考察，1923年9月，全美本笃会举行大会通过了在北京建立一所天主教大学的决定。至1925年，辅仁大学的前身—辅仁社正式成立⁶。

辅仁大学作为一所教会大学，经常被与中国近代的其它十几所教会大学⁷等量齐观。实际上，情况有很大的不同，这不仅仅是由于她是民国初年屈指可数的由天主教建立的大学，而且还在于从她的创立到办学宗旨方面，中国学者都起了及其重要

⁴ 方豪，《英斂之先生年谱及其思想》，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三辑》第23册，方豪编《英斂之先生日记遗稿》附录，第1—38页。

⁵ 见《论语·颜渊》。

⁶ 1925年成立时名“辅仁社”，为大学预科，英斂之为社长。1927年更名辅仁大学，开设文科。1929年设文、理、教育三学院，共12个系。

⁷ 近代的教会大学。

的指导作用⁸。而且这种作用，也影响到与辅仁大学密不可分的《华裔学志》。

与其他教会大学不同，辅仁大学有这样两个突出的特点。第一，辅仁大学办学的根本宗旨是，“发展中国固有之文化，介绍世界科学新知识”。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英敛之和马相伯深深感到弘扬和发展国学传统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在《美国本笃会士创设北京公教大学宣言书稿》中，他们指出：“今日者，离心离德，几无公是公非之可言。加以党阀纠纷，喧呶夺攘，求其志不为财移，财不为豪劫者盖鲜。天下事，往往千人成之而不足，一人毁之而有余；千日成之而不足，一日毁之而有余，将华夏数千年之文物作用，不但吐弃之，非笑之，甚欲尽绝根株以为快，有心人能不怒焉伤之？最可惜者，粗解旁行，浮慕西法之辈，皮毛是袭，所有家珍，徒供他人之考古，亦可谓不善变矣。本会之来，第欲以效忠于欧者，效忠于亚，矢与有心人共挽此狂澜耳。”¹⁰这段话中，即包涵了对当时激进反传统的委婉批评，也包涵了对“浮慕西法之辈，皮毛是袭”的尖刻讽刺。

英、马的办学方针，非常强调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他们还认为，强调发展“学问”，是继承和推广利玛窦、艾儒略、汤若望等传教先驱研究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业绩。“用学问为诱掖之具”这里包括了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的方面。

第二，辅仁大学在办学方针和方法方面，英、马的方针是，大胆吸收和重用教外饱学之士、重视国文和中国本土学术文化的发达。要实现重视和传播中国本土文化的目的，就必需有好的师资，辅仁大学在这方面，在教会大学中非常突出。辅大从一建校，就聘任教外人士陈垣担任校长，聘请著名中国语言文学家刘复(半农)为教务长，著名国学家沈兼士等为教授。还有：朱希祖、郭家声、朱师辙、尹炎武、张星烺、余嘉锡、马衡、范文澜等，等等。这一国学队伍的阵容，不仅在当时全国的教会大学中是首屈一指的，就是在全国的所有公立和私立大学中，也不多见。这

⁸ 辅仁大学同震旦大学，同属于天主教创办的大学，两所学校都不是教会主动创办的大学，而是民国初年仅有的由中国学者呈请和敦促下开办的。震旦大学是在梁启超、蔡元培等人与马相伯的共同努力下，由马相伯出面，呈请于耶稣会而成立的；辅仁的创立已见正文所叙。但由于种种原因，在震旦大学，中国学者并没有发挥积极主导的作用。这也是马相伯后来极力帮助英敛之促成辅仁大学的创立的一个原因。

⁹ 图沫，《辅仁大学的过去现在与将来》，载李楚材辑，《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第177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7月。

¹⁰ 载方豪编《马相伯（良）先生文集续编》，第70-80页。

些国学的名流，后来也成为《华裔学志》的编者和作者。

辅仁的上述特点，是在中国“五四”运动以后的“非基督教”和反帝爱国运动的形势下表现出来的，但应该指出的是，英、马的上述思想，早于20世纪20年代，早在英敛之在香山静宜园创办“辅仁社”起，就萌发了上述思想，而马相伯更从震旦大学的办学实践中，吸取了经验教训。英敛之、马相伯、陈垣等人的思想，对辅仁的办学宗旨和方针与方法，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思想实质，也影响到《华裔学志》。

（二）华裔学志的成立与陈垣先生的贡献

重视出版工作，是辅仁大学的传统，也是陈垣校长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早在1926年，辅仁大学就开始出版 *Bulletin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北平天主教大学学报》亦名《辅仁英文学报》），这本杂志逐渐吸引了热衷于中国文化研究的西方汉学家，成为一种学术性期刊。1929年，辅仁大学出版《辅仁学志》（中文）。这两个刊物，陈垣校长都给予了极大的关心，因为在陈垣的内心，始终有一个想法，就是要把汉学研究的中心，建立在中国。20世纪20年代以来，他反复讲过这样的话：“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日本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¹¹陈垣先生重视期刊的发行，正是这一想法的具体体现。1934年，《辅仁英文学报》停刊，而由《华裔学志》继续，其学术的水准更高了。陈垣先生亲自为她起了中文名称“华裔学志”，充分说明了其重视的程度。

《华裔学志》的主编是圣言会神父鲍润生教授，她的编委会由中外学者共同组成，中国方面的编辑成员有校长陈垣、文学院院长沈兼士（1887—1947）、历史系主任张星烺（1881—1951）、西语系主任英千里（1901—1969）、编辑助理方志澍等学者。顺便指出，《华裔学志》后来的发展中，又有中国学者受邀加入编辑队伍¹²，她一直保持了与中国学者合作的传统。

在上述中文编辑中，陈垣先生的作用是独特的。其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两点。

¹¹ 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P201。

¹² 参见巴佩兰，《〈华裔学志〉及其研究所对西方汉学的贡献》，载《有关中国学术性的对话：以〈华裔学志〉为例》，第92页注释。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

其一，陈垣先生对辅仁大学学术任务的规定，不仅是对辅仁学术方针的指导，同时也是对《华裔学志》研究方向的指导。

陈垣 1935 年发表在《辅仁杂志 *Fu Jen Magazine*》上的文章提出三点未来的计划，即：第一，有系统的整理中国的史料，并运用西方最新的研究方法；第二，通过工具书、参考书的翻译，来帮助中外学者的研究工作；第三，借助发表汉学领域研究的最新发现来促进国际学术的合作。¹³这一年，正是《华裔学志》开始出版的一年，陈垣先生的计划，后来在《华裔学志》的编辑实践中基本上都实现了。

其二，在一些重要研究方向上，陈垣先生身体力行上述的指导方针，对当时及后来的汉学研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特别突出的，是关于中国宗教史的研究。

中国著名史学史专家白寿彝先生对陈垣先生有这样的评价：“他对于中国宗教史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对中国历史文献学的研究建立了一定的基础。”¹⁴陈垣先生关于中国宗教史的研究，是从早期基督教开始的，关于元朝也里可温教，清朝学者钱大昕、魏源等人和日本学者田中萃一郎、坪井九马三等都有研究，而最后解决问题者实为陈垣先生，而且自《元也里可温教考》发表之后，无人再能深入一步。关于摩尼教，伯希和、王国维等均有研究，而摩尼教流传中国的原委学术界公认以《摩尼教入中国考》最为扎实，连伯希和、王国维都被折服。其《火祆教入中国考》不仅廓清了火祆教在中国流传的原委，还廓清了清代学者钱大昕等人有关研究的错误。关于耶稣会的研究，陈垣先生所写的《吴渔山晋铎 250 周年纪念》，《汤若望与中国和尚木陈忞》，都是开拓之作。

陈垣先生对于中国宗教史的研究，范围的宽广和研究的深入，有些至今仍无人能望其项背。关于火祆教、摩尼教、一赐乐业教、佛教、也里可温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等主要宗教，他都有专题深入的研究，他所著《回回教进中国的源流》、《火祆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开封一赐乐业教考》、《元西域人华化考》、《基督教入华史略》和《基督教入华史》，是中国历史学家对这些宗教第一次系统论述。

¹³参见陈垣，“Listening In Some Future Plans”（倾听未来的一些计划），载 *Fu Jen Magazine* 第四期，1935，P. 157。

¹⁴白寿彝，《要继承这份遗产》，《励耘书屋问学记》（代序），三联书店 1982 年 6 月版。

陈垣先生所开拓的中国宗教史的研究，后来成为《华裔学志》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尤其是关于基督宗教的研究，可以说是核心重点。关于此，巴佩兰（Barbara Hoster）女士有很好的阐释和介绍。¹⁵

（三）沈兼士与“刊物简评”以及中国学者在学术上对《华裔学志》的影响

中国学者的《华裔学志》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从刊物编辑的角度，有一件事应该首先提到，这就是沈兼士（1887—1947）和“刊物简评”（review of reviews）栏目对当时汉学研究的影响。

华裔学志的栏目，同其它杂志一样，“论文”和“书评”是其核心部分，除此之外，它设有“短文”（miscellaneous，杂文）栏目。此外更具特色的，是“刊物简评”栏目。这个栏目的设立，是沈兼士先生建议的。《辅仁杂志》（*Fujen Magazine*）曾这样介绍这一栏目：“使该杂志独具特色的是它的‘刊物简评’，在这个栏目中，逐一评论各种用汉语、日语和欧洲语言出版的东方学期刊的文章。在目前这期中（按指《华裔学志》第二卷），受到评论的是六本主要的汉语期刊和部分欧洲语言期刊。对于期刊中的每一篇文章，作者名字和文章题目都得到了翻译，内容也做了概括，并常常会得到评论。文章的主题从考古学到音系学，从文学到历史，不一而足。实际上，‘刊物简评’已经被众多杰出学者认同为他们不可或缺的助手。”¹⁶

我们知道，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汉学史上一个重要的现象，是汉学期刊的出现，她的出现同在法国开始的汉学讲座一样，标志着汉学发展走入新的阶段。在西方汉学期刊的影响下，中国和日本也开始出版期刊。期刊既是汉学的产物，汉学也借助于期刊得到发展并在学术界立足。中国史学历来有重视目录之学的传统，沈兼士作为华裔学志的中方编辑，在这点上独具慧眼的。

在具体做法上，“刊物简评”强调作者自己所写的内容提要，以防止编辑人员在评论时发生断章取义的情况。在《华裔学志》第二期“刊物简评”的征稿说明中说：

应来自各方的要求，我们打算今后在‘刊物简评’这一部分中，不仅包括汉

¹⁵ 见《〈华裔学志〉及其研究所对西方汉学的贡献》，载《有关中国学术性的对话：以〈华裔学志〉为例》，第108-110页。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

¹⁶ 译自“Monumenta Serica: A Scientific Survey”，*FUJEN MAGAZINE* Vol. VII, 1938.8 P.122。

语和非汉语的汉学文章以及相关期刊的题目，而且包括用汉语和日语写就的文章的英文概要。由此，我们希望使海外的学者同步了解这里进行的研究工作。事实上，扩大的‘刊物简评’最终可能成为一本独立的出版物，以中文的或外文的模式。它将扼要的涵盖一些边缘学科如考古学、人类学、种族学和古生物学等方面的文章。然而，由于总有这样一种危险：即评论者可能只抓住一些枝节的东西，而忽略了文章作者本人认为是本体的和本质的东西，因此我们向文章作者建议给他们的文章加上‘作者概要’，也就是一个大约 5 到 20 行或 100 到 300 个字符的综述，可以用小号字体印在文章的开头。这种方法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作者本人必须保证不被误解，不使自己通常长篇而费解的文章被错误弄得面目全非，或者使其完全被忽视，或者使其只能被相当有限的读者所了解。这些优点比起一篇浓缩的‘作者概要’所花费的些许功夫来说，是完全值得的¹⁷

当时的上述做法，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专业”的。可以说，华裔学志树立了一种学术标准，为我们今天的学术和期刊工作，也做出了一种表率。在华裔学志发行将近 20 年后，德国著名汉学家福赫伯（Herbert Frank）说：“要谈到在中国发行的最重要的汉学期刊（自 1935 年起），非北平天主教辅仁大学的《华裔学志》莫属。”¹⁸此外，从学术史的角度，通过华裔学志这些记录，我们就可以了解了当时重要的汉学期刊与国学期刊，它们是：

Anthrops 《人类学期刊》

Artibus Asiae 《亚洲艺术》（莱比锡）

Asia Major 《大亚洲》（莱比锡）

Bulletin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 《辅仁英文学志》（北京）

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法国远东学院学报》（河内）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远东古物博物馆学报》（斯德哥尔摩）

¹⁷译自 RUD. RAHMANN, S. V. D. : *Monumenta Serica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 Vol. II 1936—1937 JOHNSON TEPRINT CORPORATION NEWYORK · LONDON 1970, 第 260 页。

¹⁸H.Frank: *Sinologie*, Bern 1953,15. 转引自《有关中国学术性的对话：以〈华裔学志〉为例》，第 65 页。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2004 年 7 月。

- The China Journal* 《中国学誌》
- 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中国政治社会学评论》
- Journal Asiatique* 《亚洲学誌》
-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皇家亚洲学会中国北方分会期刊》
- Melanges Chinois et Bouddhiques* 《中国与佛学期刊》
- Orient et Occident* 《东方与西方》
- Ostasiatische Zeitschrift* 《东亚期刊》
- Quarterly Bulletin of Chinese Bibliography* 《中国书目季刊》
- Sinica* 《汉学期刊》
- T'oung Pao* 《通报》
-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东方研究院学报》
- 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 《中国西部边界研究学报》
-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哈佛亚洲研究期刊》
-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皇家亚洲学会期刊》
-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东洋文库研究所回忆录》
- Monumenta Nipponica* 《日本学誌》
- Sinologische Arbeiten* 《汉学论文》
- Annali Lateranensi* 《拉特兰编年史期刊》(梵蒂冈)
- Han-Hiue* 《汉学》
- Institut Indochinois Pour l'Etude de l'Homme* 《印度中国人类研究院院刊》
-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美国东方学会期刊》
- Lectures Chinoises* 《中国研究文献》
- Scripta Sinica* 《中国文献期刊》
- Studia Serca,* 《华西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
- Bulletin de l'Université L'aurore* 《震旦杂志》
-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学报》
- Folk Studies* 《民俗研究》
- Yenching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Yen-ching Hsüech-Pao)* 《燕京学报》
- (以上西文，共 34 种，按照刊登次序排列。)

【30】學風與傳統北京論壇

《浙江图书馆馆刊》

《金陵学报》

《清华学报》

《中法大学月刊》

《中国营造学会社报》

《辅仁学誌》

《国学季刊》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

《岭南学报》

《史学年报》

《地学杂志》

《地理学报》

《燕京学报》

《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

《考古》

《民俗》（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

《民族学研究期刊》

《文献论丛》

《文献特刊》

《文澜学报》

《禹贡半月刊》

《语言文学专刊》

《中山文化教育季刊》

《田野考古报告》

《河南博物馆馆刊》

《方志》

（以上中文，共 27 种。）

《支那学》
 《东方学报》
 《东洋学报》
 《史学杂志》
 《美术研究》
 《考古发掘于韩国》
 《满洲史学》
 （以上日文，共7种。）

以上，西文期刊34种，中文期刊27种，日文期刊7种，总计有68种之多。需要说明的是，其中的27种中文期刊，严格地说，不属于“汉学”的范畴，而应该算是“国学”¹⁹，但是，它们却集中表现了当时中国学者的最新、也是最高的研究成果。《华裔学志》的介绍，一方面说明西方汉学家对中国学者成果的重视，另一方面，这些成果也对西方汉学家的研究发生着影响。关于这些期刊介绍的撰稿人，据巴佩兰的研究和推断，有中国学者陈祥春和方志澍。特别是方志澍，可能是主要执笔人。²⁰

沈兼士发表在《华裔学志》第二期《试论“鬼”的原始意义》一文，在语言训诂学的研究上也具有开拓性的意义。这是一篇吸收汉学家语言学成果而又有所发展的典型研究，陈寅恪、李方桂等人都给以很高的评价。²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瑞典汉学家高本汉（K.B. Karlgren 1889—1978）以中国音韵学研究而享有很高名声，沈兼士的“论鬼”一文，在方法上超越了高本汉，他说“高本汉君之《汉语词类》，欲以读音之形式定语辞之义类，而其取字说义似均可商。余不自揣，欲别辟一途径以研究汉语之历史。”²²高本汉本人对这一评判如何看，一时还找不到具体的资料，但高氏晚年说过：“我毕生从事中国文化的著述，只有爱护本国文物历史而从事研究的中国学者是真正的知音。”

¹⁹笔者这里使用“汉学”的概念，指外国人研究中国的历史、哲学、语言...等等，不包括中国人自己对上述方面的研究。这样以便于对“汉学”与“国学”两个概念进行区分。

²⁰参见巴佩兰，《〈华裔学志〉及其研究所对西方汉学的贡献》，载《有关中国学术性的对话：以〈华裔学志〉为例》，第115页。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

²¹陈寅恪读了《试论“鬼”的原始意义》一文后写信给沈兼士说：“依照今日训诂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是作一部文化史。中国近日著作能适合此定义者...，惟此文足以当之无愧也。”（《陈寅恪先生来函》，载《沈兼士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202页。）

²²《沈兼士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206页。

从 1935 年《华裔学志》创刊，到 1949 年，共有 14 位中国学者发表了 22 篇文章（详见下表）。²³

华裔学志第 1—13 期中国学者发表文章列表

姓名	题目	期次	备注
陈垣	《切韵》及其鲜卑作者	1	英千里译
	关于 D.Martin 先生在内蒙发现的若干碑石残迹	3:1	英千里译
	吴渔山晋铎 250 周年纪念	3:1	E.Feifel 译
	汤若望与中国和尚木陈忞	5	Yang, D.W.译
费孝通	中国血缘关系制度问题	2	
沈兼士	试论“鬼”的原始意义	2	英千里译
	初期意符字	12	
张星烺	泉州波斯人驻军之叛乱（公元 1357—1366）	3:2	
Ch'iang I-hung	中国古代医学文献中关于人体寄生虫起源的论述	3:2	& Hoeppli, R.
Chen, H. S	北京恭王府及其王府花园	5	& Kates, G.N
陈观胜	《海录》—中国书写西方国家旅行记的先驱	7	
方志泐	E.Erkes 教授关于屈原《天问》次序之变更	7	
	裴学海的《古书疑义举例》四补（翻译）	10	
	《汪穉卿笔记》中一则关于伪造名画的趣闻	10	
	《九经三传沿革例》著者考	11	
	关于《广韵声系》	11	
杨树达	古代中国倒装宾语	7	方志泐译
王静如	焉夷和焉耆，突厥和月氏	9	方志泐译
杨宗翰	小云石海涯（1286—1324）	9	
陈宗祥	傣傣和水田部落的双系制度和氏族划分	12	赵卫邦译
季羨林	印度巴利语中的“照亮自己”	12	
裴文中	兰州天主教教堂收集的史前陶器	13	

事实上，关于中国学者对《华裔学志》的帮助与影响，并不能仅仅就他们发表

²³关于《华裔学志》1935—1949 年作者的统计，最早见于高杏佛 (Grdula Gumbrecht) 的 *Die Monumenta Serica—einen sinologische Zeitschrift und ihre Redaktionsbibliothek in ihrer Pekingener Zeit*(1935-1945)》，Koeln: Greven, 1994. 但是她的统计缺少了中国学者季羨林。

在《華裔學志》上的論文來看。他們與輔仁大學外國教師和漢學家的交往、以及他們用中文發表的研究文章，都对當時的漢學發展產生着潛移默化的作用。其中有些還是影響很大的。如張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等著作對中西交通史的研究，英千里、方志滂、陳祥春等人在翻譯、書評等方面所作的大量工作，都給了西方漢學家很大的幫助。

三、余論：《華裔學志》在中西交往中形成的特色

在討論中國學者對華裔學志的影響與貢獻時，必然會思考一個問題，即：為什麼中國學者能對一個西方的雜誌在早期發生如此之大的影響，並在很大的程度上貫穿到以後的發展中去？這就涉及到早期華裔學志自身發展的幾個特色：

（一）與大學的互動關係和漢學家角色

研究《華裔學志》的歷史，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她在歷史的發展中幾乎總是與大學有着密不可分的聯繫與互動。早年與輔仁大學的關係自不待說，1949年到日本以後，1957年與名古屋的南山大學（Nanzan University）²⁴，1963年到美國後與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California University, Los Angeles），直到2002年再次與台灣輔仁大學進行合作。這一系列的事實，凸顯了華裔學志研究群體與大學互動的特色和明顯的漢學家角色。這也是她與中國學術界和世界學術界保持密切關係而始終站在漢學前沿的一個秘訣。

聖言會對大學教育的重視，有着久遠的歷史淵源。早在1904年，當時新任命的魯南宗座代表（Apostolischer Vikar）、聖言會的韓甯鏞（Augustin Henninghaus）主教就寫信給聖言會總部，強調大學教育及學術的重要：

我請求派遣幾位學有專精的神父來推動學術及較高等的學校教育。對這件事我真的念茲在茲。理由如下：首先，天主教的教育事業對自己的教會聲譽有所虧欠。請看看在中國有關天主教的文獻以及有關中國的天主教文獻。除了耶穌會的一些貢獻外，可說完全付諸闕如，得多下功夫……。第二點，我們對中國人也有所虧欠。未來的世界很可能會由黃種人來左右，或者至少

²⁴需要說明的是，關於《華裔學志》與南山大學的學術交往，我們並沒有找到更多的資料。

在某种程度上是如此。我不知道您们在欧洲是否察觉到，在这里各方面均力争上游。我们可以藉著科学来打动中国人。如果不这样，我们会被中国人无情的甩到一边。……中国人有他们的独特的文化。所以我们必须要派些专人到中国。……假如我们想增加、强化我们在中国的影响力，那么我们在这方面就得加把劲。第三点，我们也需要这类的人才到我们的学校帮忙。如果我们的学校要进步、发展，就需要学有专精之士。但是我们不能匆忙的随便找些人来；要找的人先得学中文，换句话说，现在就要未雨绸缪。第四点，这件事最终对传教人员本身也有必要性。在漫长的传教生涯中，如果欠缺精神上的激励，人会变得萎靡不振。我总觉得，奋发向上读书对传教士来说，是第八件圣事。如果有几个能干的人手，他们就会起酵母菌的作用。……可以考虑的人选有自然科学家……，可是特别需要是汉学方面：历史学、宗教学、民族学以及汉语方面的人才。²⁵

以上这段话，我们在 100 年后的今天读起来，也不禁要为他的洞见所折服。韩甯镐主教是在“鲁南”——孔子的家乡讲这番话，而讲话者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有谁能说这不是受到了中国伟大教育家孔子的影响呢？特别是他强调“奋发向上读书对传教士来说是第八件圣事”，这不能不使人想到孔子所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的教导，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应该说，圣言会采纳了韩甯镐主教的这些意见，以《华裔学志》为代表的研究团体及其出版物，70 年来在上面提到的历史学、宗教学、民族学、以及汉语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华裔学志》的第一任主编鲍润生教授的想法，竟然与韩甯镐主教不谋而合。他在 1926 年写给圣言会第三位总会长 Wilhelm Gier(1867—1951)，说：“我得到这样的结论：对我的工作最好，也是对教会工作最能产生绩效的，便是让我在大学任职。因为我在教会所欠缺的，可以在大学找到：跟训练有素的中国人合作；有图书馆在身边以及可以到内地做学术研究之旅。”²⁶后来，他果然如愿以偿，成为圣言会在辅仁大学的一个教授。虽然时间不长，但他却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对此做过专门

²⁵参见 H.Fischer 著 *Augustin Henninghaus, Steyl* 1940, pp.284-284。转引自柯慕安 (Miroslav Kollár SVD)，〈鲍润生神父——《华裔学志》的创办者——他的生平与事业〉，《有关中国学术性的对话：以〈华裔学志〉为例》，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2004 年 7 月。

²⁶鲍润生 1926 年 11 月 11 日于上海致 Gier 函，载于 AG Ord.27。转引自《有关中国学术性的对话：以〈华裔学志〉为例》，第 58 页。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2004 年 7 月。

研究的柯慕安（Miroslav Kollá SVD）博士写道：“1933年接手这份工作以后，他整个的心思都放在如何让辅仁大学进步发展上。他对汉学及教育念兹在兹，整整三年的时间他全心全意的投入教学、汉学的研究以及他各项的计划实现，直到他突然去世。”²⁷作为神父同时也是教授的鲍润生似乎更具后者的角色。这不是一个偶然事例。汉学在近代的发展，具有了专门化的特色，而近代以来的大学，是专门汉学得以哺育的摇篮，不管研究者的身份角色、主观动机如何，要想在汉学这一专门领域里有所发展，只有在最肥沃的土壤上，才能得以实现。

大学的环境对于《华裔学志》的影响与作用，还表现在直接培养了德国年轻的汉学家，其中包括后来担任主编的卜恩礼（Heinrich Busch S.V.D. 1912—2002）和副主编的希莱伯尔（Gerhard Schreiber S.V.D. 1911—1972）。他们均在辅仁大学完成硕士论文——《后汉的思想家荀悦》（卜恩礼），《汉代的鲜卑族》（希莱伯尔）。其中卜恩礼的导师是著名历史学家余嘉锡。由于情况的变化，他们又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成为名副其实的汉学家。

（二）与中国学者的密切合作与对中国文化的认同

在《华裔学志》的早期发展过程中，以陈垣为首的中国学者给予了她不小的帮助与影响。这其中的原因，与《华裔学志》的西方汉学家对中国学者的坦诚态度密切相关。在中西合作方面，《华裔学志》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典范。当《华裔学志》第一期出版后，鲍润生教授即向圣言会的总部汇报：“中国人的合作特别重要。”²⁸

由于圣言会注意加强与辅仁大学中方学者的沟通和合作，使得学校的中外教师关系融洽。几十年后，辅仁大学校友、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乔明顺曾这样回忆：“在所有的外人所办的学校，中外人士的合作都是难以解决的问题。虽然双方都以培养人才为共同目标，但由于不同文化背景所导致的价值观的分歧和生活习惯的差异，往往引起隔阂矛盾。对此，居于辅仁主导地位的西方人士，在消弭裂痕、调整双方关系方面，作了不懈的努力。首先，他们保证中方人士在工作中有职有权，不受干扰... 其次，对中国教授彬彬有礼。每年春节教务长都到老先生宅第贺节送礼，还经

²⁷ 〈鲍润生神父，《华裔学志》的创办者——他的生平与事业〉，载《有关中国学术性的对话：以〈华裔学志〉为例》，第50页。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

²⁸ 1936年元月15日鲍润生致 Grendel 函。同上，第64页。

常对教授们宴请慰问，表示尊重。”²⁹

在同中国学者甚至是中国普通百姓的交往中，《华裔学志》的汉学家，逐步形成对中国文化的认同。鲍润生有一句名言：“我对中国越加研究，便越发喜爱中国”。³⁰

当然，中西学者的交往与合作，要从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理解，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其本质意义。对于鲍润生与陈垣的友谊，我们也作如是观。

1934年3月，陈垣撰成《从教外典籍见明末清初之天主教》，文末附“题鲍润生司铎译楚辞二绝”，云：

屈子喜为方外友，騫公早有楚辞音。
如今又得新知已，鲍叔西来自柏林。
演西也是西来客，天问曾刊艺海尘。
此日若逢山带阁，引书定补鲍山人。³¹

陈垣先生有一个补充，说：“忆民国十一二年间，英敛之先生介绍余与鲍润生司铎相识，云鲍正翻译楚辞。余甚为惊讶，以天主教与楚辞不易发生关系。惟明末西士阳玛诺著《天问略》，后列入《艺海珠尘》，天问二字，实本楚辞。雍正间山带阁注楚辞远游、天问诸编，引用利玛窦、阳玛诺、傅泛际、汤若望之说，为天主教与楚辞发生关系之始，盖已二三百年于兹矣。其引利玛窦说，称为利山人，因利亦曾自号为大西域山人也。”³²鲍润生信仰天主教，他却研究与天主教没有直接关系的《楚辞》，陈垣先生由“惊讶”到理解，他自己作《从教外典籍见明末清初之天主教》，不是仅从“教内”典籍看天主教，而是注重教外典籍的史料价值和宗教与社会政治、文化的密切关系。陈垣先生对古代宗教传播史的研究，是站在超越宗教的文化立场。

在对《华裔学志》的未来作设想的时候，陈垣先生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满怀信心的期待，有一天教会可以在中国社会中得到一个正当的地位，而现代的传教

²⁹乔明顺，〈未曾冲淡的深切怀念〉，《辅仁校友通讯》第20期。

³⁰〈鲍润生神父：《华裔学志》的创办者——他的生平与事业〉，载《有关中国学术性的对话：以〈华裔学志〉为例》，第20页。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

³¹大意是：与“方外”的僧道为友让屈原欢喜，早就有隋朝的和尚道忞注解《楚辞》；如今又遇到新的好朋友，就是从柏林而来的神父鲍润生！想当年耶稣会士阳玛诺（演西）也是从西方远道而来，他写的《天问略》收入了《艺海珠尘》，与屈原的关心多么相似！今天要是在碰上蒋骥（山带阁）这样专门收集《楚辞》注解的人，他一定会把鲍润生神父的注解也增补上！

³²见《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第226页，中华书局1980年6月版。

士也能够像利玛窦一样，被中国人视为导师并获得中国人的友谊。”³³

（三）与图书馆的不解之缘

《华裔学志》既是一个刊物，也是一个研究机构。不论从哪一方面讲，她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有一个丰富而实用的图书馆。这一事实的成因，是否与中国学者的影响有关，不好作贸然推断，但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

从远源上说，鲍润生的老师伯希和早就提出过下列看法：治“中国学”，必须有三方面的条件：1.目录学与藏书，2.实物的收集，3.与中国学者的接近。³⁴此三点意见的头一条，就是关于图书的。作为伯希和的学生，鲍润生在这一点上，做得相当出色。他从在柏林和巴黎读书的时代开始，就留心收集汉学的书籍和工具书，在北京时，已经有一个小型图书馆。在北京时，华裔学志的图书馆有相当一部分是鲍润生的藏书。高杏佛（Gerdula Gumbrecht）在1994年出版的《华裔学志：一份汉学杂志及其北京时期的编辑图书馆》一书的147至186页，有一份406部图书的目录。当然，《华裔学志》的图书远不止这些，在图书管理方面，得力于《华裔学志》编委中的Ernst Schierlitz（1902—1940），他1929年通过德国国家图书馆员考试，1930年因辅仁大学需要一名图书馆员而来到中国，积极支持华裔学志的创办，并成为编委，在图书资料供应方面给以其他学者很大的帮助。

1949年，当《华裔学志》离开中国的时候，搬运图书成了一件艰巨的工作，但在别人帮助下，终于得以顺利完成。今年，坐落在Sankt Augustin的华裔学志研究院，重修了她的图书馆，使之更加实用和漂亮，藏书也更加丰富。而大量的中文图书编目，有许多中国年轻学者的功劳。

³³陈垣，“Listening In Some Future Plans”（倾听未来的一些计划），载*Fu Jen Magazine* 第四期，1935，P. 157

³⁴《胡适的日记》手稿本，转引桑兵著，《国学与汉学》，第120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11月。